

何順文：風波疫情後 對資本主義和企業責任的反思

【明報文章】對於所有人來說，現在是一個艱難而不確定的時期。在香港，2019年的修例風波及持續的政治糾結，對社會團結安定已造成一定的影響。2020年，冠狀病毒的傳播令全球各行各業及人們日常工作和生活都受到牽連，疫情將長期改變世界政經秩序。

制度一直沒改革思考 間接加劇對抗

這場疫情危機暴現了人類社會的善與惡。可以說，每一次大瘟疫都是對人類社會的一個大檢視。修例風波及疫情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我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它提醒我們去思考有哪些共同核心價值和信念是社會仍然珍視的。

香港自九七回歸，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及50年不變的國策，受《基本法》保障。但香港一直沒有對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或經濟結構進行改革思考，沒有從制度建設鞏固香港人的社會價值共識。結果蹉跎了歲月，間接加劇部分香港人的政治訴求與對抗，陷入了今天的困境。

過去20年，人們對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自由貿易及企業責任的憂慮和批評，引起全球的廣泛關注。以私有產權、自由與法治為基礎的西方資本主義，經常被視為去弱留強和適者生存的制度，人類的私慾和自由競爭產生了成功的資本家。資本主義激勵人們主動創新、發揮潛能和勤奮工作以創造更多財富。幾百年來資本主義有一自我修正功能去改正自己的缺失，例如透過保護勞工權益法規與政府再分配政策，讓中下階層能分享到社會所創造的財富。

香港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

誠然，資本主義實際上並不一定代表自由公平市場競爭，因為市場總是不完善或會失靈的。有人指出，資本主義並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而是促進資本的積累集中、對財團傾斜、壟斷、特權精英階層、裙帶關係，及壓制勞工權益。以香港為例，在全世界最為扭曲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一，及政府放任不干預的經濟思維政策下，人們一直面對所謂「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不論其GDP及經濟增長，很多長存的經濟及社會問題（包括如貧富懸殊與缺少社會流動），已影響到其社會團結、和諧和穩定。

由於政府的不作為及缺乏產業政策，在過去30多年香港經濟及產業結構已一直被單一化，很多財富轉移到金融及地產領域。這個狹窄的產業結構雖然能提供經濟規模，但不能提升生產效率，亦未能裨益於廣大市民。香港其他傳統產業（如旅遊、貿易、零售、餐飲及物流）以低技能低增值為主，單位人力生產效率偏低，長期以來勞工薪金上升緩慢。政府及業界近年推動轉型至知識與創新型經濟，但成效仍未彰。

在西方，德國經濟學家赫爾曼在其《資本的勝利》一書曾指出，導致資本主義危機的主因是由於資本壟斷和科技型生產效率超過工資增長，導致生產過剩和消費不足。儘管生產過剩的說法並不全面，這些趨勢已抑壓了一般市民的收入增長及消費力。過多的累積

資本轉作投機性的金融及地產投資，而非用在製造生產。結果容易造成資產泡沫爆破及金融危機。

政府未能遏止投機性活動，令真實經濟受損。很多人相信現時的財富再分配模式，只有利於資本家及資產擁有者。因為港府不能有效管理土地房屋的需求及供應，香港人亦要面對天價住房的問題。香港失業率偏低也是由於香港沒有標準工時、沒有失業救濟、沒有強制醫保，和沒有退休保障等社會安全網。

新時代需要能彰顯平等、公義的制度

巴菲特（Warren Buffett）、馬斯克（Elon Musk）和蓋茨（Bill Gates）等世界大亨都公開批評英美式資本主義制度的嚴重缺陷和扭曲了人類需求。許多人認為資本主義需要改革及變得更以人為本。英國資本主義在1980年代起，已滲入了不少社會主義元素，減少惡性競爭、壟斷、剝削工人、長工時等政策，完善引入各種保障工人權益和社會福利的機制。新時代需要一個能彰顯平等和公義的新類型資本主義制度（如較接近北歐和新加坡模式）。

全球疫情大流行似乎是一個警號，提醒我們要加快改革。回歸20多年香港人似乎沒有認真思考去改革香港的管治與資本主義結構，不少人只諉過於兩地關係，浪費了很多時間，導致今日的困局。

現今年輕人當追求收入及財富時，也更重視社會公平、正義及包容。以往一向被視為聰明的一些賺錢手段或財技，如今會被認為是欺壓或剝奪小市民利益的行為。一些西方經濟學家除鼓吹「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的概念外，還主張減少工時，以便大眾有更多的時間進行社區與創作活動，並提升生活質素。

事實上，過去幾十年一些大企業集團的「賺到盡」行為，令人憂慮商界、政府與社會之間的信任會否惡化。很多上市企業高層只顧追求短期利潤和股東價值最大化

（maximizing shareholders' value, MSV），犧牲了非股東持份者（如員工、顧客、供應商、社區及環境）的利益，導致今天美式資本主義的許多問題。很多企業高層更多關注虛擬的股票市場表現，忽略了真實產品市場的重要性。過分或濫用的高管股票期權薪酬計劃令管理層過分冒險以爭取短期股價上升，也可導致過高不合理的薪酬。

MSV的一個主要錯誤假設是，法律上董事及管理高層只是股東的代理人，只向股東負上授信責任（fiduciary duty）。但事實上MSV只是一個習慣觀念或市場常規而非法規。近年北美一些新的州立法及法庭個案，已清楚說明董事及高層必須向所有不同持份者負授信責任。

不再賺到盡：轉到持份者為本管治模式

在近年商界及學術界一些先鋒對「股東價值最大化」似是而非的概念已有所反思，建議應重返原始的社會契約與企業本質，共同推動建立新一代的「持份者為本」企業管治模式。這就是相信企業高層應不止向股東負責，也要向其他主要的持份者負責，平衡各持份者利益以賺取合理利潤（而不是「賺到盡」）。

賺到盡與財技化的資本主義需要迫切改革，以拯救其正當性與可持續性。但單靠政府的公權力並不能做到，商界、學界和民間組織，如能及早作出根本的醒覺及價值觀改變，相信我們仍可以創造另一個可持續的「綠色資本主義」。

建議改革措施包括：（1）修訂公司法、上市條例與公司章程，澄清董事受信責任；（2）企業設立一個持份者諮詢議會；（3）將管理層薪酬獎賞機制更多與公司產品市場表現及其他非財務表現掛鉤，減少發行股份期權獎賞；與（4）公司承諾將每年純利的一個百分比（30%）作為中下層員工花紅獎賞，並將高層與低層員工的薪酬差距盡量縮小。

總括來說，改革目的就是要構建一個以人為本，更公平、公義、包容、共贏、和諧及可持續的社會經濟模式。筆者仍相信憑着良好的社會經濟制度、共同人文價值與文化認同，港人可跨越政治認同的糾結，較長期維持一個能有效運作的社會。

（作者按：內容只代表個人意見）

作者是香港恒生大學校長

[何順文]